

公共政策、媒体镜像与大国成长

——GPP 转换下的中国媒体面相和国家治理变迁

陈社英, 刘绩辉

(印第安纳大学东南校园, 美国印第安纳, 47150;
深圳特区报,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是一部公共政策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在“经济国家变迁”的总体公共政策(GPP)理论架构下, 对国内主流报刊媒体的独特职能和政治语境进行考察, 回顾1978年前后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影响, 反思和展现新中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治理的变迁, 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现状与趋势。研究表明, 作为GPP工具之一的传播媒体, 一方面它反映着大国治理变迁过程中的政策面相和实践逻辑, 另一方面也叙说着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对于媒体角色及其表现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总体公共政策(GPP); 经济国家变迁; 中国媒体; 大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1-0034-06

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而言, 六十年很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面对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环境中长期落后的严重局面, 即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经济, 以及连绵不断战争之后的满目疮痍。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又试图以公有化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然而共和国缔造者们的理想主义实验, 遭到了国内外政治及自身决策失误的不断干扰而陷入困境。为了避免被“开除球籍”并继续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 第二代中央领导人“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路线, 为大陆中国人带来了实惠也开辟了社会主义新道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到今天, 已远远超出了当年“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其中报刊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进行得同样彻底, 且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本文将围绕政策转变、媒体角色与科学发展这些重要相关课题作一回顾与反思。

一、GPP 转换下的共和国六十年

新中国诞生时面临的问题, 不单是低下的生产力

与落后的经济基础。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借鉴苏联经验建立的一整套社会经济制度, 在结构功能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国家”,^[1]用一个庞大的政府机器来取代私有者以管理国有经济并指导集体企业。从革命战争到经济管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跳跃; 学习苏维埃模式已经不容易, 在各种封锁中向西方取经更少可能。更重要的是, 意识形态斗争并未随着战火熄灭而结束。上层建筑从思想改造、以马克思主义取代“资产阶级伪科学”到最后“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其中有得有失, 但终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形成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应该说, 中国在过渡时期及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 亦曾自觉地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虽然方法上有违客观经济规律、脱离实际而导致“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失误, 但通过全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仍成功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以至有研究者认为即使“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也并未能将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但是, 六十年代提出的那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是如此地根深蒂固, 不仅导致了“十年浩劫”, 而且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仍然给国家前途留下巨大的阴影与未知数。“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

收稿日期: 2009-10-20

作者简介: 陈社英(1955-), 男, 湖南常德人, 美国加州大学博士, 印第安纳大学东南校园终身教授, 中南大学客座教授, PPLG 学术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 老年福利与健康, 高等教育管理。

线的荒谬, 首先在于其过时的阶级定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一个经济概念变成了唯心的政治工具, 且将允许垂直社会流动的阶级结构实际上变成论出身的封建种姓式制度, 与今日对新的社会阶层及其矛盾的研究及国外仍受到尊崇的马克思主义冲突论是两码事。其更大危害, 则在于随意扩大、无限“上纲上线”、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造成经济国家的高度政治化, 使得“唯生产力论”、“经济挂帅”、“复辟资本主义”等罪名成为改革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 社会主义优越性无从谈起。

本文作者之一曾指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历史功绩, 在于经济国家的去政治化, 即“拨乱反正”, 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2]“经济国家变迁”理论架构的意义, 则首先在于总体公共政策 (general public policy, 或 GPP, 即政策体系中优先目标及首选手段的主导作用) 研究的重要性。与强调基本路线或总路线作为不可动摇的政治路线不一样, 总体公共政策包括不断的或动态的综合性行政管理研究, 以帮助确定并及时调节整个政策体系的优先目标及首选手段, 发现即使看似合理的(如“大跃进”)总路线下可能存在的问题, 通过设定议事日程及宏观决策来适应各发展阶段重大需求的具体变化, 并为各部门政策的研究提供全方位指导。具体来说, 这一架构不仅强调 1978 年前后截然不同的目标方法取向(或优先次序)及其深远影响, 而且进一步关注社会高度经济化、市场化之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蜕变, 即去政治化之后随着经济改革又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去经济化(正如许多学者所呼吁的朝加强社会服务方向发展的进一步职能转变)。在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 经济国家变迁的研究及对总体公共政策及时调整的建议将有助于中国社会问题的预防和解决。从国际上看, 许多国家尤其西方执政党的情况与中国共产党强调基本路线之间很难找到可比性, 而国家总体公共政策的学科化研究将有助于国际交流及从比较中找到一些共同规律。又如, 中国改革开放前与西方福利国家基本上没有共同语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了许多类似的问题与需要, 但在相关的研究中却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导。在经济国家变迁理论架构下的深入比较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空缺,^[3]帮助建立科学发展观, 并突破西方模式而体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 明确鉴识不同的发展战略, 防止非发展或反发展的总体公共政策在国际舞台上重演。

二、作为 GPP 工具的媒体变迁三十年

媒体在历史进程中, 是风向标, 是晴雨表。作为中国主流媒体, 重要报刊的独特职能在于传播政策及作为舆论宣传工具。在各种因素影响下, 对国家发展有积极贡献也有过负面影响, 而 1978 年前后截然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可为媒体的转变提供理论解释。在经济国家变迁过程中, 我们可考察媒体在改革开放及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下面将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2008 年)的变迁分为四个时期, 并力求从重大标志性事件入手, 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和媒体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

第一时期: 历史转折(1978-1988)

首先是两篇震动全国的文章: 一篇是以特约评论员署名, 光明日报首发, 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转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另一篇是辽宁日报首发、人民日报转载、范敬宜执笔的《莫把开头当“过头”》。这两篇文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氛围中,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从“左”倾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1978 年 5 月 11 日, 经过半年酝酿, 10 多次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火热出炉, 光明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刊登了这篇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执笔,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主编王强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和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等多次讨论修改, 署名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4]该文在思想封闭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引发了持续近半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中, 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的社会共识, 催生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的发端。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国家领导人走上历史舞台。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进行拨乱反正。全会的中心议题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从而实现了总体公共政策划时代的转变。

但全会之后的 1979 年初, 全国出现了一股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倒春寒”, 人们对改革认识不一致, 有的说好, 也有的说“过头”, 有人甚至说“辛辛苦苦

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农村大部分基层干部没有从“左”倾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三中全会政策得不到落实,反对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呼声有漫延之势,很多实行土地承包制的地方又退了回去,得到土地的农民担心则政策有变。^[5]

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一版刊发《莫把开头当“过头”》述评文章,5月16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转发并加显著按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保证生产形式自主权的关键,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党的方针政策。”^[6]文章用事实回答了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怀疑、抵触的人,给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本时期媒体的作用及其代表: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解放思想的先声,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那么《莫把开头当“过头”》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的落实扫清了思想障碍,厘清了思路。该时期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及代言人,尤其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性大报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宣传工具,人们从媒体主要是报纸来观察中国政治的走向,而媒体在确定改革大方向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引领了舆论的走向。光明日报、辽宁日报等北方媒体是开路先锋,人民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央改革的声音,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媒体重在引导人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清除左倾思想,避免经济国家走政治化的回头路。评论发挥了报纸的“旗帜”作用。

第二时期:政治波澜(1989-1991)

1989年物价大幅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加剧,引发了“六四风波”。“六四风波”平息后,1989年到1991年三年间,中国经济进入整顿阶段,从过热到趋于平稳。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代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他还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7](296,300)}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中,“姓社姓资”的诘难再次抬头,加上国际社会的抵制,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降。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跌至改革开放30年中的最低点,GDP增长率只有3.85%,到1991年底,全国企业利润下降67%。腐败问题与民生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很明显,中国经济与政治都面临着继续前行还是倒退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进入“低谷”。

199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由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等人共同创作)的系列评论首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在改革低谷的中国溅起了浪花。这篇评论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直到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之二《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又见诸报端。4月22日,皇甫平压轴之作《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见报。文章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文章大胆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徘徊阶段吹响了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号角。

本时期媒体的作用及其代表:1991年“姓社姓资”争论的核心,就是要维护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能不能有市场经济?改革的大门是继续打开,还是关闭?皇甫平系列评论在改革处于“低谷”时期的中国让媒体再次走到了政治博弈的前台。与此同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瓦解,社会主义道路还能不能走下去?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应该怎么办?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该时期,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之一,走在了改革的前沿,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交锋表现于媒体,并进入白热化。解放日报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了超前的眼光,代表了中国改革的思路,及新总体公共政策下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评论在严峻的政治角逐中,依然起着媒体其他报道形式不可替代的“旗帜”作用。

第三时期:改革深化(1992-2003)

1992年1月19日至23日,邓小平在武汉、深圳、珠海、上海考察,在改革步履艰难、航向不明的情况下,发表了他著名的“南方谈话”。由于当时邓小平已退休,对这一非官方考察,媒体接到了“不报道”的通知。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中国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怎样搞,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团,让很多人倍受鼓舞。

1992年2月20日到3月6日,《深圳特区报》以《扭住中心不放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多干实事》《两只手都要硬》《共产党能消灭腐败》《稳定是个大前提》《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题,连续发表八篇猴年新春评论,巧妙地传达邓小平在深圳的讲

话精神, 评论的标题借用了邓小平的原话, 在南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八评”中的四篇, “八评”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有专家事后总结认为“一家地方报纸的评论, 在新华社没有发通稿的情况下, 传播得这么广泛, 在广东新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1992年3月26日, 深圳特区报又以长篇通讯的形式, 刊发了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第一次公开而详细地报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 将南方媒体推向了改革的风口浪尖。

邓小平在南方考察时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肯定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经验, 指出: 特区姓“社”不姓“资”, 姓“社”姓“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 步子要快一点, 要大胆试, 大胆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全国各大报纸广泛转载, 成为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

随后, 这股南国春潮北上, 影响到全国的政治中枢北京, 再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确认, 迅速传遍全国, 辐射到海外, 形成了一股新的改革春潮, 中国重新恢复了改革与开放的活力。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全国改革和发展的“行动指南”。《东方风来满眼春》也被人们称为“早春南国的一声春雷”。

本时期媒体的作用及其代表: 在有人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之时, 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和尖锐的国内意识形态争论一度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东方风来满眼春》适时、准确地记录了邓小平在社会变革关键时期发表的稳定大局的重要讲话, 为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抉择, 充当了“开风气之先”的排头兵角色。“南方谈话”再次确定了中国改革的航向, 重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同时强调了消灭腐败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于加快深化改革的步伐, 使改革开放的航船走出困境起到了关键作用。媒体从党和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开始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 为改革开放呼号、呐喊, 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以深圳特区报为首的南方媒体在“大胆试, 先行一步”的精神鼓舞下, 成为改革开放的吹鼓手。从地方媒体到全国大报, 从言论的“旗帜”作用到以通讯为载体, 媒体在政治的漩涡中回归到中国新闻的特质——在客观反映现实中引导舆论、推动社会发展。

第四时期: 大国崛起(2003-2008)

2003年到2008年, 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 总体公共政策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进一步向社会经济平衡的方向发展。同时, 崛起的中国开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展现在世界舞台。这期间有三件大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 也影响了世界。

第一, SARS与问责风暴。2003年4月20日下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站在台上发布信息并接受记者咨询的不是卫生部长张文康, 而是副部长高强: “截至4月18日, 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 其中北京339例。”而此前官方披露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官方说法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但4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却再次将北京定为疫区。发布会上官方首次承认, “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的疏漏”。

当日, 新华社发稿, 各媒体转发: 中共中央决定, 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 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两天后, 孟学农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中国各地开始了疫情的公开、准确、及时发布机制, 各地方媒体实行一日一报, 掀起了防治SARS的全民动员大战。

在本次事件中, 媒体处于被动报道的位置。从最初媒体的沉默不语, 到一日一报的刊发疫情报告, 媒体始终担当着“党和政府喉舌”作用, 但反映了新时期总体公共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趋势。以责任人的免职为象征, SARS被认为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第四代中央领导人执政以来掀起的“问责风暴”的开端。中国灾情报道从此“破冰”, 报道空间开始扩大。

第二, 汶川地震与万众一心。2008年5月12日下午, 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 十几分钟后, 新华社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了地震消息, 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半小时后便滚动播出地震灾区的各方信息, 全天24小时连续直播地震灾情达十多天之久, 从地震的震级, 到每日上升的死亡人数, 从灾区的救援情况, 到全国各地的支援, 13亿人民的中国展开了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全民大行动。无数感人的场景, 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国, 传向世界。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奔赴灾区; 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积极组织抗灾, 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务实作风, 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同时也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本次事件的报道颇有特色: 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中央四大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时间将灾情及时、准确地传遍全国, 各地方媒体积极配合, 形成多层次、多角度、

全方位的报道阵容。网络在灾情报道中进入主流媒体的行列,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新闻评论开始退出报纸的“旗帜”作用,而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个性评论,以百花齐放的方式,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取代了报纸传统的“评论员”、“社论”文章的主导地位。报纸由党的声音,更多反映民众声音。网络、电视、报纸,党报、都市报等形成媒体大合唱,媒体进入多元化时代。在内容上,转向以民为本、贴近民生,在罕见的特大事件中突显了总体公共政策的最新发展,即在坚持“一个中心”的前提下着力解决社会重大需求,力求建立和谐社会以达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并在方法上采取真正开放式、多元化的途径。

第三,奥运会与辉煌2008。200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国内灾害、恶性事件频生,国际舆论众说纷纭。但8月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又把中国推向了新的辉煌。虽然奥运火炬传递巴黎受阻,在各种非难指责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为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忍辱负重。完美的奥运开幕式震惊了世界,开赛期间的各项优质服务感动了国际友人。通过奥运会,世界更多地认识了中国,中国也更多地展示了自身。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中国走向更加成熟。

奥运会本身成为北京人的奥运、中国人的奥运,而不再主要是一种政治象征。奥运会亦成为中国媒体走向信息透明公开的一个有力推手。网络在媒体的合奏中,在推动政府的公开、透明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主流报纸从传统高高在上的“教条”中走向草根,报纸从以往生硬的面孔变得更加贴近生活,贴近民生;媒体更多地以全球化眼光审视世界、反映现实。

综上所述,无论是重大政策的出台,还是改革航向的确定,报刊媒体都成为引导舆论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媒体在重大方针政策实施过程中,作为政府的“喉舌”又作为群众的代言人,始终处于社会发展的风口浪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媒体从简单的见证者(反映现实),发展为无形的影响者(引导现实),到积极的推动者(创造未来)。在客观反映现实和顺应民意的世界洪流中,中国媒体变迁的轨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一样跌宕起伏,始终处于支持变革还是奉行保守的风口浪尖,在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中,交织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时而疾步前行,时而步履维艰,但总体趋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逐步走向更加自主、开放和多元。但是,批评报道仍是中国媒体报道的软肋,“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模式虽在逐步瓦解,却依然存在。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反腐败的力度还

需加大。贫富差距加大,媒体更多地代表着社会发展中的强势群体,草根的声音虽然在加强但依然弱小。

三、结语

振兴中华,任重道远。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饱受战火蹂躏的落后农业国到一个真正现代化(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民主法制社会保障健全)的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还只刚刚学会走路。在这学习过程中,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前三十年因经济国家的高度政治化而丧失的各种机会以及许多人所继续经历的磨难。但是,中国尝试了将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及苏维埃模式计划经济付诸自己的社会实践,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初步的实力。“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中国打开了另一种机会之窗,那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向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开放。而总体公共政策的转变,使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国家真正有了可能通过开发市场经济来集中精力搞建设。

要继续发展,中国无疑需要继续刻苦学习。人事更替会为领导层带来新的知识结构,但知识更新是每个决策者、研究者和参与者的责任。中国当前强调科学发展,就是要求观念进一步更新。这包括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再认识和对国家总体公共政策的深入研究与及时调整(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欠缺,有待擅长路线研究的中国学者去开拓)。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到“全民经商”再到今天真正向往社会和谐发展的曲折过程。虽然政策规划制定中从来不乏“平衡”这个字眼,平衡和谐发展的实现,不仅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努力,也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并继续为经济建设这个政策主导(无论是否继续作为一切的中心)所制约。一般来说,政策重点会不断随局势变化,及时调整则对保持方向至关重要。只有在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新总体公共政策指导下,结合国情积极学习国际社会先进经验,寻找合适的途径以求达到更高平衡发展战略,才能确保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同时积极解决预防各种社会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及全人类共有的价值理想。

与此同时,报刊媒体的独特职能,决定了其在促进政策转变与科学发展方面应有的重要推动作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环境中,报刊媒体的难堪无可避免。但在改革开放中的大潮中,报刊媒体跟着学

游泳、跟着呛水, 但也不乏领导潮流的佼佼者。当前总体公共政策研究的前沿, 是如何在继续发展经济、深化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精简政府)的同时, 朝加强社会服务的方向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总体公共政策本身并非一个“主义”, 但要坚持社会主义, 就要明确其应有的价值观, 并通过总体公共政策的相应及时调整, 帮助中国社会问题的预防和解决。从先进社会理想回到落后生产力的现实是当初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 但在借助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之后, 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问题又会从另一端逐渐变得越来越突出, 而研究探索社会主义要比学习资本主义困难得多。为此, 政府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更新思维方式以适应形势转变, 包括总体公共政策进一步向综合平衡发展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机遇, 而媒体则要发挥应有的独立思维与舆论监督作用, 防止非发展甚至反发展的政策倾向, 并防止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阻碍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 [1] Chen Sheying. *Social Policy of the Economic State and Community Care in Chinese Culture: Aging, Family, Urban Change, and the Socialist Welfare Pluralism*[M].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6.
- [2] Chen Sheying. *Public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llustrated with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State*[M]. Dubuque, I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2004.
- [3] 陈社英. 总体公共政策与发展战略: 国际视野下中国案例透视[J]. 改革与战略, 2008, (6): 1-9.
- [4] 陈桔. 回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编辑经过[J]. 钱江晚报, 2008-07-17(1).
- [5] 本网讯. 分清主流和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DB/OL]. 人民网, 2004-03-05.
- [6] 范敬宜. 基层有真理, 无情因有情——追忆“莫把开头当‘过头’”的采写经过[J]. 新闻战线, 2008, (11): 24-25.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96, 300.

Public Poli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Media Publication under a Changing GPP

CHEN Sheying, LIU Jihui

(1.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east, New Albany, IN 47150, USA;

2.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Shenzhen 518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60 years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icularly the dramatic changes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o clarify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n “economic state in transition”, the extreme politicization of social life before 1978 is contrasted with the “great transfer” in Chinese general public policy (GPP) afterward. The unique function of media publications is reviewed. Specific cases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contexts and assess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a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specially in “opening up” and reform, as a major GPP means. Issues concerning another shift of China's GPP toward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untry's determination to pursue a unique socialist and scientific rout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General public policy (GPP); economic state in transition; Chinese media; socialist and scientif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编辑: 颜关明]